

# 东北亚格局变迁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

夏季亭 齐廉允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4)

【内容摘要】二战之后,东北亚格局进入一个急速变动与重塑的阶段。这种变动既是各国根据形势发展调整内外政策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局势的更新。东北亚格局的变迁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最适宜的发展机会,而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反过来又加速了东北亚格局变迁的步伐,并强化了格局发展的模式与趋向,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

【关键词】东北亚格局 变迁 战后日本经济 复兴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9-0054-05

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经济资源方面,东北亚地区都是世界列强的必争之地,二战后这里更成为大国矛盾和利益的集中区与交汇点,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动态的地区关系推动了东北亚格局的不断更新,作为东北亚体系内的重要行为体,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就起步于这种动态的地区格局中,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区局势变动带来的机遇,成为充分利用国际机会的典型代表,当然,日本经济的复兴又使地区局势呈现新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因此,探讨二者的关系,不仅可以厘清战后东北亚格局发展的特点与走势,还可以明晰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到的外部机遇,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为一国利用国际机会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 一、战后东北亚格局变迁考察

二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重要转折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重构必然影响到地区格局的变迁,东北亚格局随之由中美苏与日本的对抗变为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其实,美苏之间的对抗早在战争期间拟定的规范战后国际格局的雅尔塔体系中已露出端倪,为确保既得利益,两国既互相妥协又针锋相对。这种关系模式一直持续到战后,最终演变成以冷战为主要形式的对抗。

东北亚历史的变动与发展无不被纳入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体系中。两国对抗直接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南北分治。美苏关系由战时合作到战后对抗这一转变过程对中国国共关系演变、特别是中国内战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美苏对抗助长中国内战的爆发,并不是这一时期中美苏关系的全部。实际上,国共两党的根本对立,及其各自借助美苏外来力量追求自身目的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激化和促成

了美苏冷战的最终形成<sup>①</sup>。美苏关于二战后对日本占领及控制权的争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全面展开,战后更是针锋相对。不过,苏联在与美国争夺对日控制权上处于被动局面,尽管如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苏联依然想方设法对日本施加影响,美苏的角逐与博弈仍在继续。

随着世界范围内冷战局势的加强以及地区力量的消长,美苏两强对抗的东北亚格局又呈现新的发展态势。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和苏联原子弹成功爆炸使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化,日本因与苏联地理上最接近而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向外渗透的“防波堤”,其战略重要性因之凸显,谁控制了它,谁就在欧亚大陆最左端获得了一块美国国际问题理论家斯皮克曼所谓的“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地。美国国务院认为“只要继续保障日本岛的安全,失去中国将不会使我们的地位直接受到影响”<sup>②</sup>。因此,为了尽快帮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从1949年秋开始,美国国务院将对日媾和问题提上日程,并确立了在苏联不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媾和的方针<sup>③</sup>。为此,1949年12月23日和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制定了48/1号和48/2号文件,正式将日本纳入其东北亚防御体系之中,两国向着盟友关系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促使苏联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气息笼罩的国际环境中增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恢复国民经济与未来国家建设等方面考虑,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1950年2月14日,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把正在形成中的美日同盟视为未来的对手,条约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

\*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抗美援朝战争地位与影响”成果之一(05BF20)。

\* 作者简介:夏季亭(1960—),男,山东英才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齐廉允(1976—),男,山东英才学院世界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得对日和约的缔结”<sup>[4]</sup>。

一般说来,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引起另一国的“敏感性”反应。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加速了美国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转向。就在中苏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让日本独立。受此影响,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现在必须修改原来的东亚政策,加速对日媾和<sup>[5]</sup>。恰如沈志华先生所论,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美国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sup>[6]</sup>。无疑,中苏同盟条约刺激了美国对日媾和决策的尽快出笼,但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何尝不是美日接近促成的结果呢?正是对美日威胁的忧虑才促使中苏接近并成功缔结同盟条约。美日媾和决策的形成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实为一个互动过程,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过程共同构筑了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联合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防御体系。两大集团不仅在战场上血战,还在经济、外交等领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美国对日媾和的步伐,杜勒斯就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sup>[7]</sup>。在1951年9月美国主导的对日单独媾和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波兰等国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重申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sup>[8] (P339)</sup>。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屡屡被动的苏联决定反击,在1952年9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对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动用了否决权。中苏还延长了苏军撤出旅顺的期限,在斯大林看来,苏军驻留旅顺“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亚两大集团对抗的地区格局不仅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反而表现出更加强烈而愈益泾渭分明的发展态势。两大阵营一方面强化集团内部的协作、沟通,以增加自身的安保系数;另一方面,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削弱对手。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军事上正式形成对峙局面。经过战争的考验与锤炼,中苏朝的同盟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迎来了同盟关系的“蜜月”期。美日韩同盟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53年11月,美韩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同盟建立。1960年1月,美日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两国同盟体制得以深化。由于历史积怨长期敌视的日韩关系开始改善,1965年6月,两国正式签署《日韩关系基本条约》等文件,实现邦交正常化。美日韩三国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得以建立。

不难看出,战后东北亚格局虽几多变迁、扑朔迷离,但

却于千般变化中呈现出一个明显趋势,即由美苏两强对抗向中苏朝与美日韩两大集团对抗转变。之所以有此趋势,是因为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建立某种体系或格局是有效的安全自助模式。“在这样的体系中,各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同盟或联盟)进行合作,以增进它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sup>[9]</sup>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各国都在依据变动了的形势主动调整内外策略,确保自身利益,而策略调整形成的合力又会推动地区体系的新发展。这种互动使世界趋向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对体系内的国家而言,这是挑战,任何国家必须顺应而不能无视甚至违拗它,这更是机遇,变动蕴含着机会,机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 二、东北亚格局变迁与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互动

东北亚格局变迁与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一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二者互为原因,又互为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优势,排斥盟国,从单独军事占领和控制对日管制机构方面实现了对日本的独占,加之,美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它因东北亚政治生态发展的需要而调整对日经济政策无疑会产生重大的效果与影响。

二战后的初期,中国在美国的东北亚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还只是美国改造的对象,美国对它规定了严格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目标。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由削弱转为扶植,努力使日本成为其称霸亚洲的基地和反共防共的堡垒。1948年10月以后,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帝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为盟友,取代中国对抗苏联势力在远东扩张和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冲击<sup>[10]</sup>。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美国逐步放宽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大幅降低赔款数额。1950年10月,美国甚至不顾各受害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坚决反对,在“对日媾和七原则”中提出了放弃索赔要求的主张,“缔约各方放弃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sup>[11]</sup>。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虽“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sup>[12] (P340-341)</sup>如此一来,日本的赔偿对象仅限于领土被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各国,苏联、英国等许多对日作战国被排除在应得赔偿国家之外,赔偿范围大大缩小,赔偿方式也被限定在劳务赔偿之上,决定日本赔偿额度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而是以不损害日本“可以生存的经济”为限度。美国把赔偿的主动权完全交到了日本手上。

削减战争赔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日本的负担,但对日本经济复兴并不能起到直接作用,因此,要复兴日本经济,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努力“排除日本振兴对外贸易过程中



现存的诸种障碍,促进日本出口的恢复与发展。”<sup>[12]</sup>基于此目的,1949年12月通过的NSC48/2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在东南亚建立日本的替代市场以振兴对外贸易。该文件还声称要断绝共产党中国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中日之间的贸易活动显然并没有因一纸政令而完全禁绝,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仍达到3311.9万美元。<sup>[13]</sup>很明显,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并没有排斥日中有限贸易,而是将它与开发东南亚市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管制,切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相应地,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也彻底排除了日中之间的有限贸易。此后,美国才把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1951年5月通过的NSC48/5号文件和6月出台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标志着“日本—东南亚—美国”构想已成为美国确定不移的基本国策。NSC48/5号文件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做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和媾和后都要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使其能够从事对美国和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sup>[14]</sup>

美国1952年2月编制的NSC124/1报告书指出:“从东南亚的贸易中排除日本,将给日本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从而会增加日本对合众国的依赖程度。因此,如果失去东南亚,特别是失去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就将给日本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致使对阻止日本与苏联集团将来势必发生的和解造成极大的困难。”<sup>[15]</sup>不过,这种过度依赖东南亚的政策对日本经济复兴并没带来十分明显的效果,在丧失了中国市场后,尽管有美军“特需”订货的援助,日本经济仍显得捉襟见肘。毕竟,仅靠战争“特需”刺激下的经济繁荣并不能持续长久,尤其是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前景的出现,日本对外贸易状况不断恶化,1952年前6个月,日本出口就已下降了1.4%,而后6个月则猛降了13.7%<sup>[16]</sup>。日益恶化的对外贸易状况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日本产品找寻新出路。为此,杜鲁门总统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对日政策问题,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便是NSC125/2号文件。该文件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最重要途径是开发东南亚市场和推动日本进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市场。

不过,日本经济由《朝鲜停战协定》出台、“特需”终结衍生的严重危机却没有因将东南亚各国放在首位的经济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既然短期内无法指望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那美国就必须为日本寻找新的更加广阔的市场,当务之急就是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使其有条件进入美国与欧洲市场。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美国提出日本先非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方案,并以2/3多数票顺利通过。1954年8月,在讨论日本贸易问题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首先完成与日本的双边关税谈判,为日本商品开放美国市场<sup>[17]</sup>,这表明美国已将日本入关列为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最主要目标。1955年9月10日,在美国的扶助下,日本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从入关后的

第二年开始,日本接连出现几次“景气”现象,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到1968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成为东北亚地区不容忽视的力量。

调整对日经济政策是美国应对变动中的东北亚局势的重要策略与手段,这种调整也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与繁荣的重要助推力。当然,任何时候,一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该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自然也不例外。

### 三、东北亚格局变迁:日本经济发展的机遇与应对

二战后急剧变动的东北亚格局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地区局势发展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东北亚局势的发展要求日本加快经济复兴的步伐,这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契机,另外,日本政府也在积极应对,以恰当的方式作了合适的安排。有利的环境加上政府的有效作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道路愈发宽阔起来。

#### 1. 美国对日援助力度的强化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复兴

美国自占领之初,就对日本进行救济性援助。从美援的数量变动来看,1946年至1949各年度分别为1.93亿、4.04亿、4.61亿、5.35亿美元。随着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调整,援助金额也在逐渐增加。据统计,自1945年起至1951年美国对日经济援助停止为止,美援金额总计达21.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输出总额的39%<sup>[18]</sup>。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后,日本又从美国进出口银行、民间商业银行和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得到大量融资。仅1953-1966年3年间,日本就从世界银行得到了8.6亿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对日贷款的年利率在4.625%-6.625%之间,偿还期限为14-26年。<sup>[19]</sup>在美国的积极援助下,到1948年底,日本工业生产指数由两年前的39.2%(1934-1936年的平均指数为100)提高到61.8%,国民生产总值也比两年前增长了23%。

#### 2. 赔款减少使日本有可能将更多的财力集中在经济复兴上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战败国之一,日本负有向被侵略国赔偿损失的义务。但在当时特殊的世界局势下,苏联、澳大利亚等国放弃了索赔权,实际上最后只有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索赔300亿美元。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日本最终只支付了纯赔偿费10.12亿美元,另提供经济贷款7.166亿美元,二者合计17.286亿美元<sup>[20]</sup>,只占应赔偿额的5.7%。此外,日本支付赔偿的时间也被拉长,最长可达20年。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日本“利用赔偿重新打入东南亚,也提供了绝好的途径”<sup>[21]</sup>。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额1955年为3.84亿日元,实施战争赔偿后1961年猛增至10.32亿日元<sup>[22]</sup>,通过战争赔偿,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市场。多数国家索赔权的放弃和索赔实际费用的削减及延缓,为日本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并大大减轻了负担。仅中国一国,在对日作战中,直接财产损失就达313亿美元,而当时日本每年收入才仅有7.7亿美元,如果日本对此进行赔偿,需要近50年才能还清。

#### 3. 战争“特需”订货是日本经济的重生妙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产品和劳务的“特需”订货急剧增长。1950年,日本接受美国的“特需”订货为1.49

亿美元,1953年增加到8.09亿美元,至1955年“特需”已累计达到35.3亿美元。“特需”活跃了日本工矿企业的生产活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重、化工业部门的许多工厂承担了广泛的军用劳务,日本大部分的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也集中投入与军事关系密切的电力、钢铁等部门,促进了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1950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能力仅达到战前(1932-1936年平均)的83.6%,可到了1951年就超过了战前水平而达到114.4%。到1953年,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55%。“特需”带来高额利润,据三菱经济研究所统计,日本加工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在1950年上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一年间,从2.7%提高到10.5%,增长了3倍。<sup>[23]</sup>在利润增加的基础上,产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投入也活跃起来。据日本开发银行调查,这期间的产业设备投资总额从1950年的2344亿日元增长到1951年的4389亿日元,增长了87%。可见,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亟待扩大商品市场、增加生产能力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对此,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认。日本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如果50年代初不发生朝鲜战争,日本就绝不可能在60年代末成为经济大国,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了10年时间。正是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得到了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乱(指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sup>[24]</sup>

4.军事负担的减轻使日本可以从容地将大量资金用于经济建设

军费是国民收入的扣除,军费的增加会影响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战后日本来说,这笔费用实为巨大负担。战争结束初期,日本处在美国占领之下,军费支出受到极大限制。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美军担负起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不设正式军队,在军事上依赖美国。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日本的军费开支绝对额虽在持续增加,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44年此项比例曾高达85.6%之巨,1950年猛降到3.33%,1955年和1960年再降到1.54%和1%,此后便在1%的水平之下徘徊,如1965年为0.97%,1970年为0.80%,1971年为0.85%<sup>[25]</sup>,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军费开支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日本的防御花费是如此地少,因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美国担保它的福祉。”<sup>[26]</sup>据估算,如果日本像美国那样,从1954年到1974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的6%~7%用于国防开支,那么,它在1974年的经济规模将打30%的折扣<sup>[27]</sup>。

5.东北亚地区稳定局面长期存续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

日本是资源缺乏、国土面积小的“加工贸易国”,使得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这就决定了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必然会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朝鲜战争之后,东北亚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长期存留,地区关系进入冷战阶段,尽管各国军备竞赛在加重,彼此之间的摩擦、冲突也从未中断,但大范围的冲突与战争则几乎没有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谋求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56年,联合国也接纳日本为其中一员。日本还陆续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这些政

治和经济地位的获得使日本赢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出口贸易额在世界上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1955年,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仅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4%,至1960年便增至3.6%,而到了1970年,则增加到了6.9%。

变动中的东北亚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最适宜的机会和环境,不过,事物的发展,外因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内因才是根据。因此,战后日本经济的飞跃,除了由于各种国际机遇的出现,还在于日本政府的主观选择和有效利用机遇的机制。日本经济战略的确定、经济政策的出台都从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发展机会的基点出发。1950-1962年,先后设立多家银行向主要产业提供长期低息设备资金,对重要机械及合理化需要的机械、开发研究用机械设备及新技术企业化用机械设备等实施特别折旧制度,建立特别退税制度及出口损失准备金以鼓励出口,鼓励技术引进,1950年有27件,1952年为133件。正是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战后日本经济才得以快速复兴与迅猛发展。

#### 四、结论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格局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之中,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国都主动调整内外政策以适应变动的地区格局,从而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战后日本是东北亚格局变迁的最大受益者,它充分利用地区格局变迁带来的便利,不仅完成了经济复兴,还为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基础。变动的地区格局不仅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还推动了日本政治地位的改善以及军事力量的提高。

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充分利用有利国际环境发展自己的典型样本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能无视甚至刻意割断国际机遇,但妄图单纯依靠国际机会发展的唯机会论也不足取,因为从发现机会、预测机会到用好机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体制、人才等方面的条件。只有充分利用内外两方面的有利条件,才能推动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307-308.
  - [2]Nam G. Kim. From Enemies to Allie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U.S.-Japan relations,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7: p.21.
  - [3][日]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M].东京有斐阁,1985:41.
  - [4]大公报出版委员会编.国际重要文献[M].大公报出版委员会,1951:112.
  - [5]FRUS,1950,Vd.I:347-349.
  - [6]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 [7]FRUS,1950,Vd.VI,p.1243.
  - [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M].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 (下转第70页)



林德布罗姆曾提出,在一个冲突的社会中,形成社会共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强大的公共权威通过压制性的方法制定制度与规则,并强制性地将它们加给社会,在这里,国家庞大的官僚系统和暴力机器都是强制服从的工具与保证;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来解决冲突,寻求合作与共识<sup>[9]</sup>。多元主义的合作是建立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而法团主义强调组织制度化的作用,认为个人的决定受到组织规则的影响,因此,法团主义认为“社会参与是以行业划分的功能团体形式,他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资格和权利,并相互协商制定有关的政策”。<sup>[1](P24)</sup>

在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的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比如权贵阶层与弱势群体的矛盾、官员阶层与其它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城市阶层与农村阶层之间的矛盾等等,而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在社会这个共同体内得到解决,各阶层之间不能达成谅解与共识,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是“一纸空谈”。因此,各阶层和各社会组织应当本着互惠、相互尊重对方合法性权利的精神解决矛盾与冲突。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使冲突各方更容易达成妥协、消解冲突。罗尔斯认为通过相互尊重而形成的互惠观念和以德报德的倾向是社会合作的基础,“基本的观念是一种互惠的观念,一种以德报德的倾向……假如没有这种倾向,我们的本性就会变得非常不同,而富有成果的社会合作也会变得十分脆弱,假如不是变得不可能的话”。<sup>[9](P461)</sup>

社会心理学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相互作用越充分,合作的倾向也越强<sup>[10](P416)</sup>。在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协商过程中,双方为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往往要经过反复的协商、沟通、对话,这样的协商是一种正和博弈,增加了合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以对抗或暴力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因此,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组织应当在国家权威的主导下,通过沟通与协商来有序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结语

与多元主义追求个人自由和秩序的平衡不同,法团主义认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大量的代表个人利益的组织的建立只能带来低效的参与和秩序的混乱。它主张通过建立利益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通道,将民意通过国家承认的利益组织融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以制度化途径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合法化,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但以法团主义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在协调各利益团体的冲突过程中,只是扮演一个中立协调者角色,而不是有所差别的对待或者将国家的意志强加给各利益团体;其次,国家并不是全能的,它虽然在整合利益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导地位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国家权力不能延伸到社会领域;最后,法团主义毕竟是舶来品,在应用到政治实践时应结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 [1]张静.法团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2][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3]任建涛.从冲突理论视角看和谐社会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6(1).
- [4]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5][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竺乾威等译.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6][美]罗伯特·达尔.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主编.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8]Charles E.Lindblom,The Intelligence of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1959).
- [9][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上接第57页)[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拉格夫.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572.

[10]仇朝兵.1947-1948年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人民出版社编.对日和约问题史料[M].人民出版社,1951:62.

[12]FRUS,1948,Vd.VI,p.858-861.

[13][日]日本通产省编.日本通产产业政策史(第4卷)[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214-215.

[14]FRUS,1951,Vd.VI,p.35-38.

[1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M].商务印书馆,1980:790.

[16]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p.90.

[17]FRUS,1952-1954,Vd. XIV,p.1693-1694.

[18]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93-94.

[19]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2.

[20][日]安原和雄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4卷)[M].三省堂,1984:156.

[21][日]有泽广巳.鲍显铭等译.日本的崛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633.

[22]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M].大藏省印刷局,1962:309.

[23]金明善等.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M].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74.

[24][日]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经济史(总论)[M].大藏省印刷局,1957:320.

[25]东洋经济新报社编.经济统计年鉴[M].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164-185.

[26]Jerome B Cohen Ed.Pacific Partnership,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Prospec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eventi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1972 p.4-5.

[27]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ed.. Asia's New Giant: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6 p.45.